

巴士底狱倒下了，但又站了起来

《旧制度的最后七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传统写作的风格，蒙太奇的章节镜头感重新塑造了三级会议召开的众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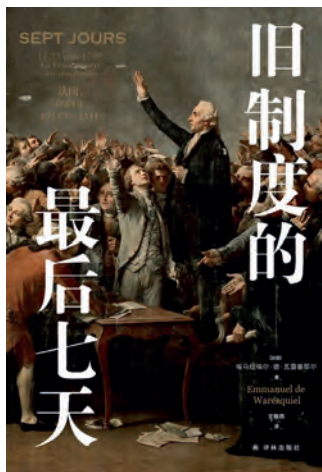
□ 撰稿 | 阿 隆

1789年1月，41岁的教士西哀士出版了一部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在巴黎掀起了极其广泛的讨论，其中那句“第三等级就是一切！”瞬间引爆了巴黎的舆论场，在这本小册子的帮助下，聚集在这里开会的代表与市民联合起来将原本讨论国家事务的三级会议变成了国民议会，并成为了攻占巴士底狱的革命宣言。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这个万余字的小册子是促成法国大革命的“原由”，毕竟里面并没有我们后来熟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口号，它的影响力仅限于几百个第三等级代表和少量的巴黎民众。它只是无数汇聚成革命之海的涓涓细流之一。革命到底是如何逼近的？在离革命最近的一周里，历史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旧制度的最后七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传统写作的风格，蒙太奇的章节镜头感重新塑造了三级会议召开的众生相。相较于启蒙运动——大革命的粗暴逻辑链条，瓦雷基耶尔成功塑造了一场多层次的象征革命：启蒙理性的巴士底狱代替了旧制度的巴士底狱。

旧制度的失败就在于，它其实只是一个建立在巴洛克式国家繁复复杂仪式上的产物。当路易十四让桑松把法兰西第一次绘制在地图上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看似



《旧制度的最后七天》
[法] 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著
译林出版社 2026年2月

书讯

《赵孟頫 忽必烈时代的中国书画》

此书聚焦于赵孟頫在蒙古统治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作为中国士大夫艺术家的身份成长与艺术实践演变。赵孟頫的核心艺术生涯与忽必烈统治期高度重合，这一时期的中国书画不仅奠定了日后的文人画传统，更同步推动了艺术评论、艺术传播方式等的发展革新。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元代文化精英，通过效仿唐代及更早的汉文化艺术传统，在蒙古统治的异质语境中推动汉艺术的“复兴式转型”。这些讨论不仅为解读赵孟頫艺术成就提供了新视角，也帮助我们理解忽必烈时代中国书画艺术的转型动因，从而回答元代风格革命的重要问题。

广袤无垠，看似均质化的国家，实际上国王与教士、与第三等级、与贵族，他们之间的关系从来都只是一种调和式的妥协，从来没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的主动，而当第三等级汹涌澎湃的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国王和教士真的可以站在一起吗？国王和贵族真的可以站在一起吗？这就是法国旧制度根深蒂固的问题。国王在空前的财政赤字下失去了笼络一切的能力，在无远弗届的统治中失去了乡村，也失去了巴黎。

第三等级成功地让人们相信，特权只存在于贵族内部，仿佛资产阶级并不享有贵族那样的豁免权。而法国绝大多数人口都依靠土地为生，第三等级代表中却几乎没有大农场主和乡村代表。资产阶级对那些“袋子里的土豆”（马克思形容法国农民的经典比喻）做的，是比贵族更严酷、更全面的控制。《人权宣言》墨迹未干，就已经蜕变为纯粹的象征计划。后来的第三共和国总统梯也尔曾这样形容革命：

“想象的现实”已占据一切。的确，当政治剥离了现实，血流成河只是迟早的事。攻占巴士底狱是一场纯粹的象征革命，从国王到第三等级，巴士底狱完成的符号交换并没有改变巴士底狱本身的政治功能。革命前的七天，似乎也预示了革命后的漫长时代，首先接过这个符号的，是罗伯斯庇尔。■